民俗钱概述

一、何为民俗钱

民俗钱即指人们为辟邪、祈福、供养、游戏、瘗葬、记事等而铸制的钱币形牌饰。专供佩戴、悬挂、摆放、礼赠、随葬和庋藏之用。它是民间习俗的产物。

钱币学和民俗学的蓬勃发展，向我们提出了民俗钱的起源、发展、演变、种类、时代特征、文化内涵、艺术风格等一系列的问题。对这一领域有进一步研究探讨之必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吸收、继承祖国瑰丽的文化宝藏，推动民俗学的发展，更好地保护民俗钱文物，使其为现代化建设、为人类精神文明服务。

二、民俗钱的起源

民俗钱究竟起源于何时，钱币学家和民俗学家多有专文论述，一致认为是西汉时期。目前发现最早的民俗钱，铸于西汉时期（实际民俗钱的出现可能还要早一些），是一种上有方形系孔、下有圆环的钱币形饰物（图一·1）。这类钱的文字比较单调，一般是一面书“去殃除凶”，另面书“辟兵莫当”；或者一面书“日入千金”,另面书“长毋相忘”、“君宜侯王”、“君宜子孙”等等。上述祈祝语也见于汉代的其他器铭，尤其是西汉的一种铜镜——日光镜上（图一·2）。历代民俗钱均有与前代或同时代的铜镜铭文相似者，民俗钱与铜镜有许多共同之点：首先是材质。铜镜在元、明以前绝大多数为青铜铸造，民俗钱也是这样。铜镜绝大多数为圆饼形，民俗钱多数也是圆饼状；铜镜可以佩戴，而民俗钱的主要功能就是佩戴。民俗钱的纹饰、铭文有许多是与铜镜的纹饰、铭文相近或者完全相同。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铜镜以后，并不仅仅满足于照面鉴容，同时也赋予了它第二功能——装饰的功能。于是在铜镜上铸造各种纹饰和铭文。纹饰多以花草、虫鱼、蜂蝶、瑞禽、瑞兽、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为内容。铜镜多数能佩戴，不同阶层不同行业所佩铜镜的铭文也应有区别。如著名的“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日光镜，可能就是妻子或父母、朋友送给远离久别的丈夫或儿子、朋友的志念物。而“日入千金、长毋相忘”日光镜则应是送给远去经商之人的。较早的西汉民俗钱“日入千金、长毋相忘”与同一时期的“见日之光××××”日光镜从词义和语法结构上几乎完全一致，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么，其用途也应与上述两种日光镜的志念作用是一样的，而唐、宋时期一种镂空民俗钱上的单龙、双龙（图二·1）受汉代龙纹镜（图二·2）纹饰的影响，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在其他种类的民俗钱中还可以举出许多与铜镜铭文、图案、花饰相似或相同的例子。见图三～图九。



1. 西汉“去央除兇辟兵莫当”民俗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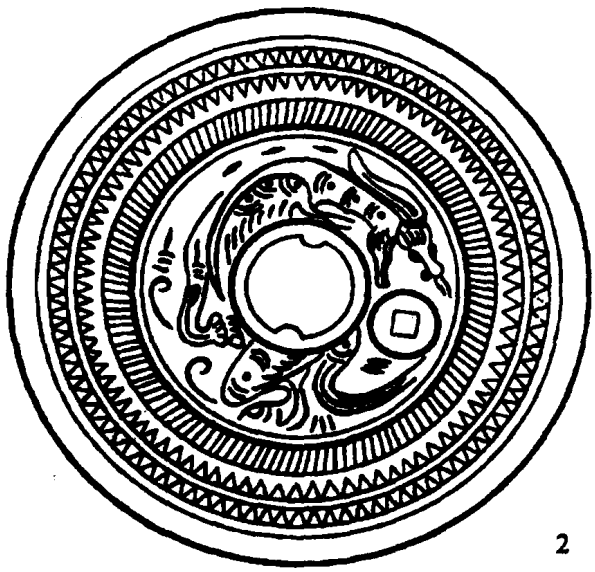


2. 西汉中晚期的“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小铜镜

图一



1. 唐、宋时期双龙纹镂空民俗钱。



2. 东汉龙纹铜镜（原大 1/2）。

图二



1. 唐宋时期四莲花纹镂空民俗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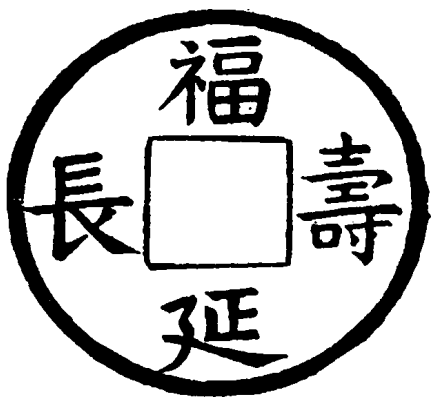


2. 金代四莲菱花纹镜（原大 1/2）。

图三



1. 金、元时“福寿延长”小铜镜。



2. “福寿延长”民俗钱（《古泉汇》摹本）。

图四



1. 清代吉语铭文小铜镜。



2. 清代吉语民俗钱。

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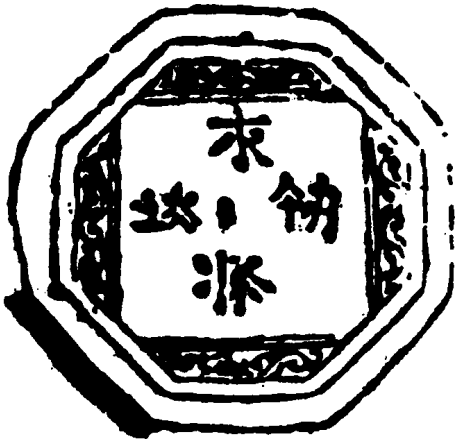


1. 清代太极八卦小铜镜。



2. 清代八卦铭文民俗钱。

图六



1. 辽代契丹小字铜镜。



2. 辽代契丹小字民俗钱。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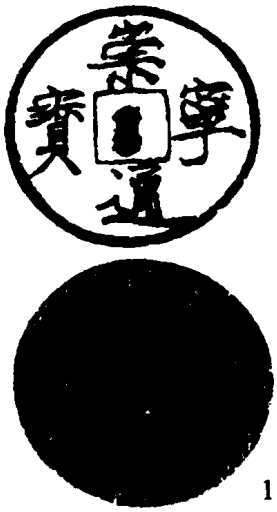


1. 十二生肖纹小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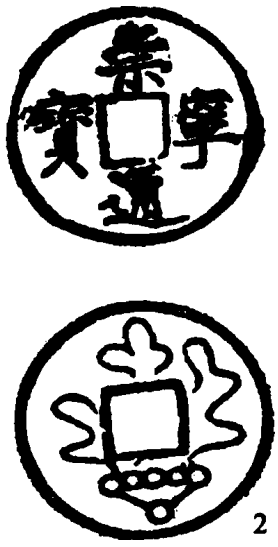


2. 十二生肖纹民俗钱。

图八



1. 年号钱文小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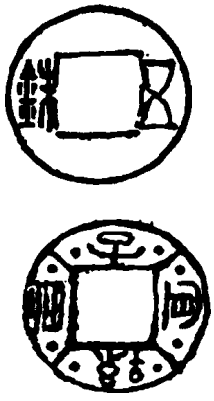


2. 年号民俗钱。

图九



1. 西汉“君宜侯王长宜子孙”铜镜（原大 1/4）.



2. 东汉“子孙宜昌”五铢钱。

图十

不但汉文化的镜、钱有此渊源关系，少数民族的镜、钱也是这样（见图七）。文化、艺术的影响是相互的。民俗钱装饰图案的发展，也影响到铜镜和其他艺术。图十～十二是瓦当艺术影响铜镜、民俗钱艺术的实证。铜镜艺术影响了民俗钱，反过来又吸收了民俗钱中的精美艺术。它们在相互吸收和借鉴中共同发展。没有一种纯粹向外辐射的艺术。铜镜的装饰艺术不但是民俗钱艺术的源泉，也是瓦当艺术的源泉。同样，精美的瓦当艺术也反过来影响铜镜和民俗钱艺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西汉“千秋”瓦当（原大 1/4）。



2. 西汉“千秋万岁”瓦当（原大 1/4）。



3. 唐代“千秋万岁”小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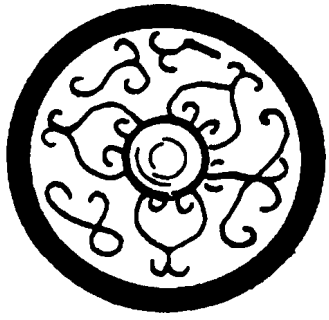


4. 辽代“千秋万岁”民俗钱。



5. 宋、元时“千秋万岁”民俗钱。

图十一



1. 东汉至北朝时期三花纹瓦当（原大 1/4）。



2. 唐、宋镂空花草纹民俗钱。



3. 唐、宋镂空花草纹民俗钱。



4. 西汉双虺纹瓦当（原大 1/4）。



5. 西汉双虺纹瓦当（原大 1/4）



6. 唐、宋镂空双龙纹民俗钱。

图十二

民俗钱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完全是古人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一种反映。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开始脱离蒙昧，思维得到很大发展。但同时人们又是在极端困苦和险恶的条件、环境下生活，对自然现象如雷电、洪水、森林大火、日蚀、彗星、毒蛇猛兽的伤害，甚至一个小小的自然现象或奇异生物，都会产生巨大的惊恐和畏惧感。在不能做出科学解释时，便联想到在人类社会之外，一定还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宇宙间的一切，包括人类的命运。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在监听、监视着人类的一切言语和行动。这种力量就是“神灵”。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很缓慢。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仍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可是对“超自然”的力量——“神灵”的信念却大大加强了。同时又创造了更多更离奇的“神灵”。认为“神灵”是万能的，它不但有无限的力量，而且有无穷的智慧。它来无踪去无影，雄武威严，它的听力和视力都是无限的。人和其他动物办不到的事，“神灵”能办到；人和其他动物听不到的，“神灵”能听到。而且“神灵”还是惩恶扬善的仲裁者。一个人哪怕是微小的善恶，都是不能掩蔽“神灵”耳目的。所以，人在“神灵”面前必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一心向善，如果有恶的意念和行为，早晚都要遭到“神灵”的惩罚报应。人们大都认为命运是生前由“神灵”注定的。命运一旦注定，就是至死不可改变的。生活中的大富大贵、大劫大难、坎坷遭际，也都是“神灵”在每个人的生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为什么有人大富大贵，有人遭劫逢难，人们认为这都是前世（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有前世，今生是前世之某人、某星宿或某种动物转世而来）或祖宗功过所致，在现世应得到的报应。如果一个人希望此生或彼生（大多数人也相信人是能转世的，与前世继续，在六道中永远轮回）得到荣华富贵，就必须诚心诚意做善事。如果希望改善处境，子孙昌盛幸福，也必须多做善事，向“神灵”进贡——进香、供钱物（这里“神灵”不过是担了个喜欢钱财的名儿罢了），必须向“神”祈祷、祈祝，以期得到“神灵”的原宥和恩赐。人们把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诸“神灵”的造化。人们的美好愿望便是祈求和祝福；对于恶害的憎厌便是诅咒。进而见诸行动的，便是铸作于器物、铭刻于金石，而且愈来愈多、愈来愈广。凡为祈福祝愿、消灾解厄、辟邪、镇压、进香供养、喜庆、记事，靡不做器以志之。由于民俗钱大小适中，便于携带，且钱币本身即是吉金，所以都乐于铸成钱形物以供佩戴或装饰。民俗钱可谓每钱都是诗、是书、是画。每个图案都是一个优美的故事。其内容包罗之广，内涵之丰富是任何一部史、志、小说都无法媲比的。

三、什么是“厌胜”，什么是“厌胜钱”

“厌胜”一词始于王莽。《汉书·王莽传》：“……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厌”即压的意思。“厌”的繁体为“厭”，下加“土”为“壓”（压的繁体字）。“厌”的古义是以势压服和震慑。《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齐师围成，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曰：‘将以厌众’”，这里是说败其小部，造成齐师败绩的假象，以震慑大部队，进而达到瓦解全军的目

的。“压”的字形（繁体）结构是“厌”下加“土”，其古义当是专指实物从上向下加以重力。《国语·鲁下》：“夫栋折而榱崩，吾惧压也”。“厌”、“压”字意基本相同。“厌”、“压”古声同韵亦相近，常可互假，至迟也在战国初年两字即可互借。所以自新莽、唐、宋以来，所称“厌胜”，又可以叫“压胜”。“厌胜钱”又可以叫“压胜钱”。

王莽笃信阴阳谶纬之学，从他几次更改币制的原因中即可得到证明，如王莽在第二次改币时就是为了避讳“金”、“刀”等字。所以他废除“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两种刀币及“五铢”钱而作“六泉”、“十布”。非但如此，且“刀”、“金”作旁的“刘”（繁体）字也在避讳之列。一是他篡夺刘汉政权而贼人胆虚，最害怕刘氏子孙反夺权。恶人而及姓。另一原因是王莽名字与“蟒”谐音。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使王莽自觉与蟒蛇认了亲族。金、刀是斩杀蟒蛇最得力的刃具，所以王莽怕应“金刀斩蟒”的谶语，故，怕刀也恶“刘”字。且“刘”字本身即是兵器，又有杀意，人且为之悚，蟒（莽）岂有不惮之理。“莽亲之南郊”，以 144 斤（王莽时，一斤约合今 240克，一石为 120 斤，约合今 28.8 公斤）的铜，铸造一个约 57厘米长（王莽时一尺合今约 23厘米）、烟斗状（象征北斗）的大铜勺放在将台上，以表自己与众不同。这样就可能使众兵将慑服，进而为其效力去征匈奴，打赤眉、铜马、新市、平林等起义军。笔者窃以为王莽在威斗上也一定还铸有盟誓或诅咒性的铭文。因为秦汉以来的方士、卜巫的厌胜之法，就是利用人们相信“鬼神能惩罚人类”的迷信心理，而以发誓、诅咒来震慑人们的。以诅咒来取胜，以诅咒来致人于死地，达到敌亡我存的目的。“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这是最早记载厌胜之法和厌胜目的的。关于厌胜思想的起源则要早得多。春秋时期，六国争霸，歃血为盟及把盟书埋于地下（最著者有“侯马盟书”）就是一种厌胜。谓：谁背盟就要遭到盟会时所刑白马、黧牛或猪、羊的命运。（当时除将马、牛、猪、羊之血盛入饮器，供与盟的各诸侯国君主盟誓轮饮外，还要将马、牛、猪、羊的胴体供于案上，以祀天、地、神、祖等。这些被宰杀的纯色牲畜叫作“牺牲”）。到了汉代，厌胜思想更加发展了，厌胜之法的应用也更加普遍。公元前 91 年，汉武帝长子刘据及其母卫皇后遭绣衣使江充诬陷，以至于太子起兵诛江充，最后兵败自杀的惨剧。江充谎称太子刘据与其母后在东宫做汉武帝木偶并写上诅咒之语埋于地下（意咒武帝速死，使太子早登极）。这是西汉著名的“巫蛊之祸”。如果江充所说的不是谎言，那便是戾太子及其母后的一种厌胜法。再有公元前 89 年，汉武帝的大将李广利伐匈奴，为匈奴所俘。因李广利在汉是勋戚，故狐鹿姑单于以女妻之，而且受尊宠在匈奴右大都尉卫律上。这就遭卫律等人的切齿嫉恨。恰逢单于母久病不愈，卫律等人指使胡巫说：“先单于震怒，过去胡祀兵，常言要用汉贰师将军李广利祭，今已获李广利，为什么不用？用则母阏氏（按：匈奴皇太后）必愈。”结果李广利被杀祭。这是以人做“牺牲”的厌胜法。当然历史上杀人厌胜的例子还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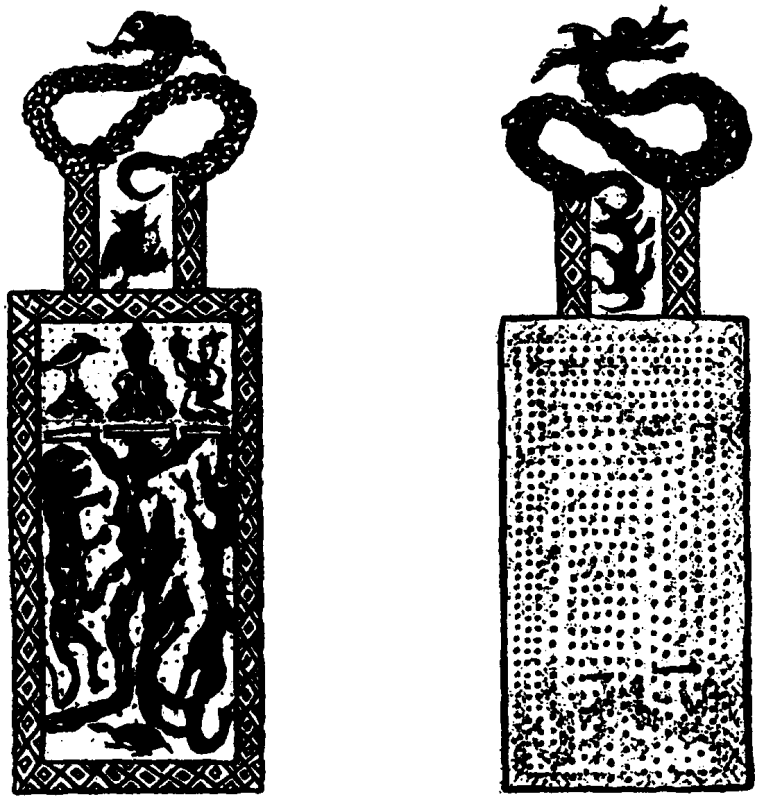
自秦汉以来，方术之士即有所谓“东南有天子气”之说。“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① 东南有天子气。”后来，历代在中原作皇帝的人都对东南十分警惕，惟恐出来

① “黄旗紫盖”是帝王出行之仪。斗，牛，二十八宿中斗、牛分野为东南方，指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一带。

个新“天子”取而代之。许多皇帝为了厌胜目的，往往要巡幸江南，压一压“天子气”。隋大业元年(605年)、六年（610年）、十二年（616年），炀帝曾三次巡幸江南，就是借口东南有“天子气”而去厌胜的。隋炀帝的厌胜法是以帝王的凌人盛气去震慑新生的反对派势力。未几，隋炀帝命殒东南，新“天子”却起西北。

隋、唐以后，厌胜之法五花八门，书符作法，铸作钱形物等成为主要的厌胜方法。“厌胜”除了诅咒人之外，也可以诅咒邪神和鬼祟。人们把天灾人祸、生活中的坎坷、久病不愈等等均信为有邪祟在作怪，故每每厌胜之。

“厌胜钱”一词，最早是谁人首名已无从稽考。《宣和博古图》载明是北宋中期人李孝美。李氏在其《钱谱》中把一种面文为“永安五男”，边郭有粟纹的大钱称为“厌胜钱”。北宋末年的宰相王黼在其《博古图》(《宣和博古图》)中把汉代的一种大铜牌饰（图十三）疑为“厌胜钱”，并引汉武帝“白金三品”中的龙、马、龟纹之说，称这种大铜牌子“一体之间、龙马并著，形长而方，意有类于此（何按：指白金三品）。然下体蟠屈隐起粟纹似非汉武帝之制者。又李孝美图谱有‘永安五男’钱，体势虽圆，轮廓皆著粟纹，与此（何按：指上述东汉大铜牌饰）稍类。然孝美号之曰厌胜钱，则是钱（何按：指上述大铜牌饰，这里王黼已将大铜牌称为‘钱’)殆亦用之为厌胜者乎？”自《博古图》将这种大铜牌饰附会为李孝美所说的“厌胜钱”后，后世钱币著作往往转引，并附会为汉代厌胜钱。其实李孝美所说厌胜钱是指“永安五



正　　背

图十三（原大 1/2)

男”钱，此钱郭中也有粟纹，以粟纹便断定这种大铜牌饰为“厌胜钱”。近代钱币著作上为了说明李孝美首称“厌胜钱”，皆转引《宣和博古图》中王氏所说的那段话。现代研究“厌胜钱”的学者直接把上述那种大铜牌子称为“厌胜钱”。从《宣和博古图》中可知李孝美并没有说这种大铜牌子是“厌胜钱”，只是王黼那样认为。那么，如“图十三”所示的这种大铜牌是不是厌胜钱呢？窃以为非。这种大铜牌从造型上没有“钱”（布币、圆钱、刀币）的特征，图案是汉代常见的一种图案——四灵（四神）。在铜牌的面部上方中间为西王母，左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右为王母的侍者。此牌铸造粗糙、个体笨重，通钮高 20.5 厘米，宽约 6.5 厘米，厚约 0.5 厘米，现代考古曾在东汉墓中发现过，它可能是一种装饰牌。而李孝美所指的厌胜钱是“永安五男”钱以及类似的有辟邪祈福意义铭文或图案的圆钱形物。这类钱形物在南北朝末期至北宋中期已不甚罕见了。综上所述，厌胜钱只是一种为辟邪求福而铸制的供佩戴、悬挂、摆放的钱形饰物，它是民俗钱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许多的民间风俗也都要铸制一些钱形饰物以志念。如祝贺婚姻、祝贺家庭、祝贺寿诞、祈求太平、祝愿出行以及供养、瘗葬等，都无“厌胜”的意思，而是志庆、纪念、记事、祝福、祝愿的意思。民俗钱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厌胜钱所包含的内容。

四、民俗钱的时代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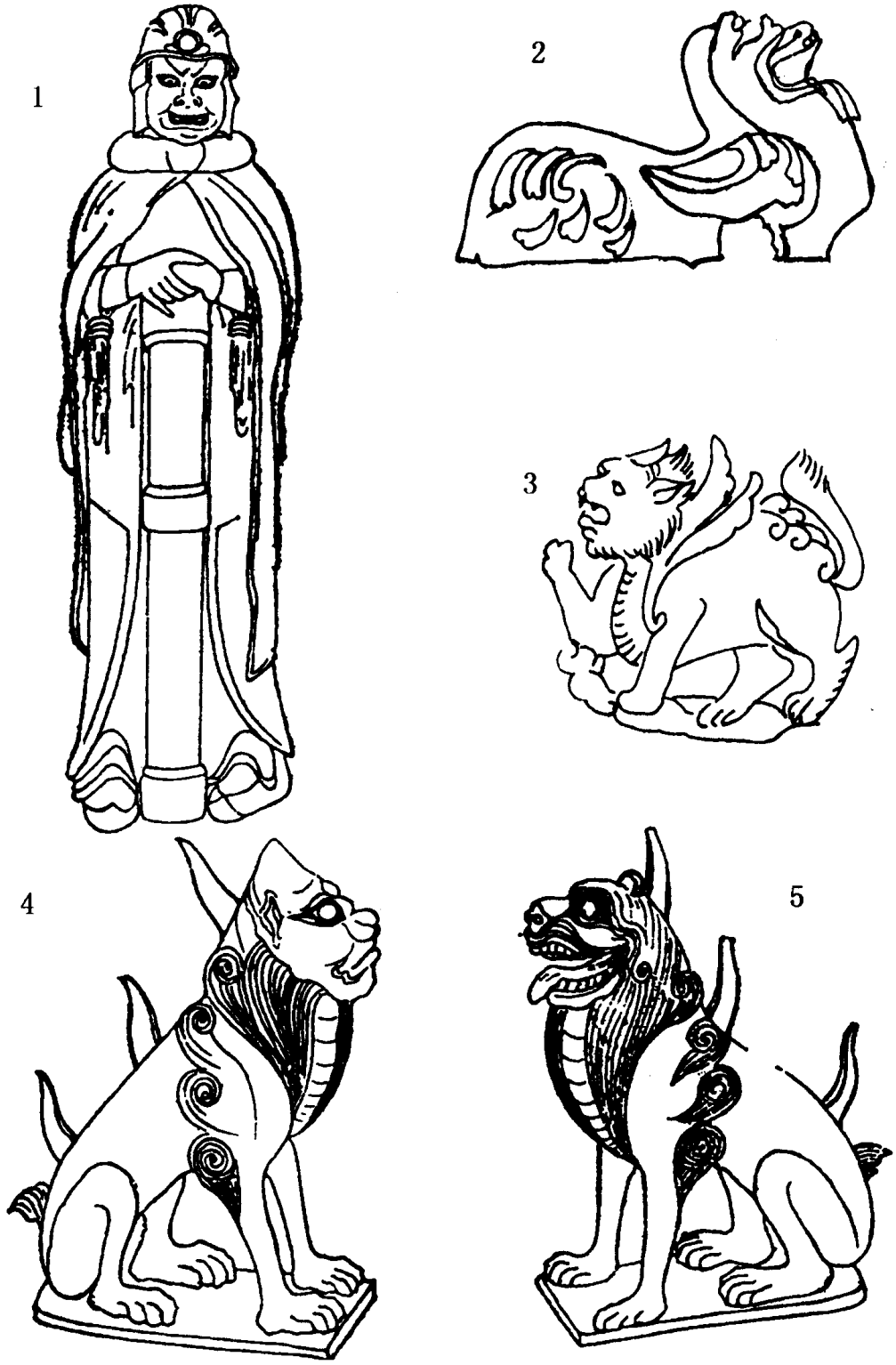
据对现有民俗钱实物的考证，试分为四个时期：（一）汉至南北朝时期；（二）唐宋时期；（三）金元时期；（四）明清时期。

（一）汉至南北朝时期

目前发现最早的民俗钱为西汉的“长毋相忘……”一类上系下环钱形佩饰（见图一·1），此外尚有“五铢”面、背吉语，图案或与酒令有关的钱币。三国、南北朝早期，未见有可信的图谱或文字描述。从现有资料分析，两汉至南北朝早期的民俗钱铸造较少。因为这一时期的厌胜品、吉利品主要通过铜镜来表现，其次是一种陶、石质怪兽（通称“辟邪”或“镇墓兽”）和似人非人的武士——力士（图十四）。而大量铸造钱币形辟邪品、吉利品应是从南北朝末期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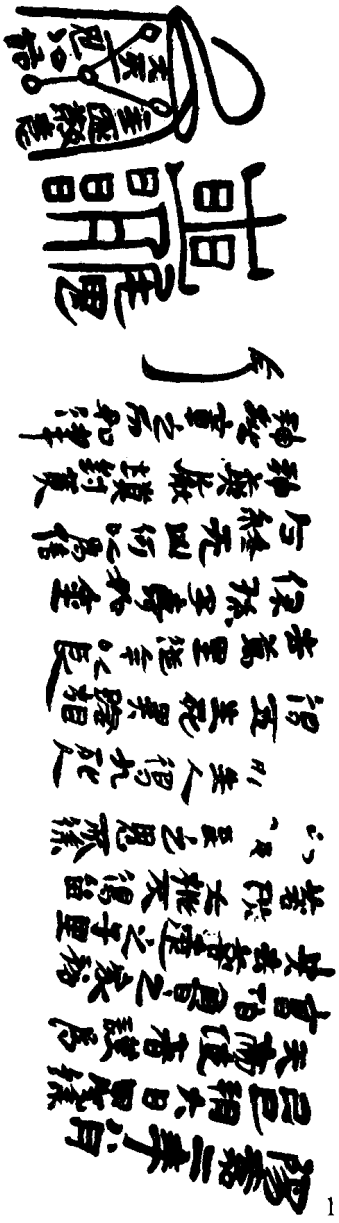
自春秋、战国发展起来的神怪、鬼祟等迷信思想，经过漫长的两汉，到南北朝时期已达到顶峰。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十分昌盛，道教形式的完成也是在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在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中已有很深广的影响。中国社会自三国到南北朝末期已经历了 320 余年的分裂，长期的割据、兼并以及内部的夺权斗争，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饥寒交迫。而统治阶级却把自己长期统治人民，鱼肉百姓，极奢淫逸的生活归功于天、地、神、佛，于是便驱使劳动人民大量建寺庙、修浮屠（“佛塔”之音转）、凿石窟、献供养，这又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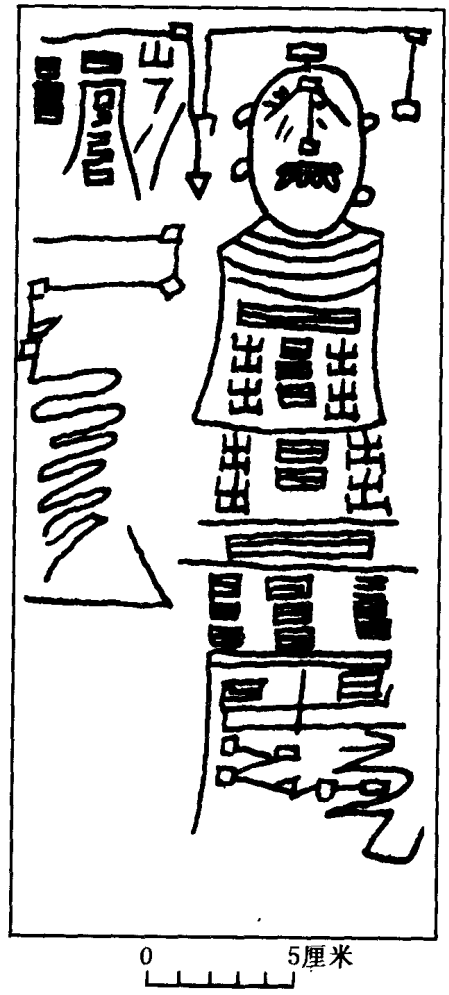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十四

1. 武士俑　2. 石辟邪　3. 辟邪　4.5. 镇墓兽





1. 东汉墓出土陶罐上的朱书咒语及符文　2. 五代水井砖上的符录(摹本)。
(摹本)。

图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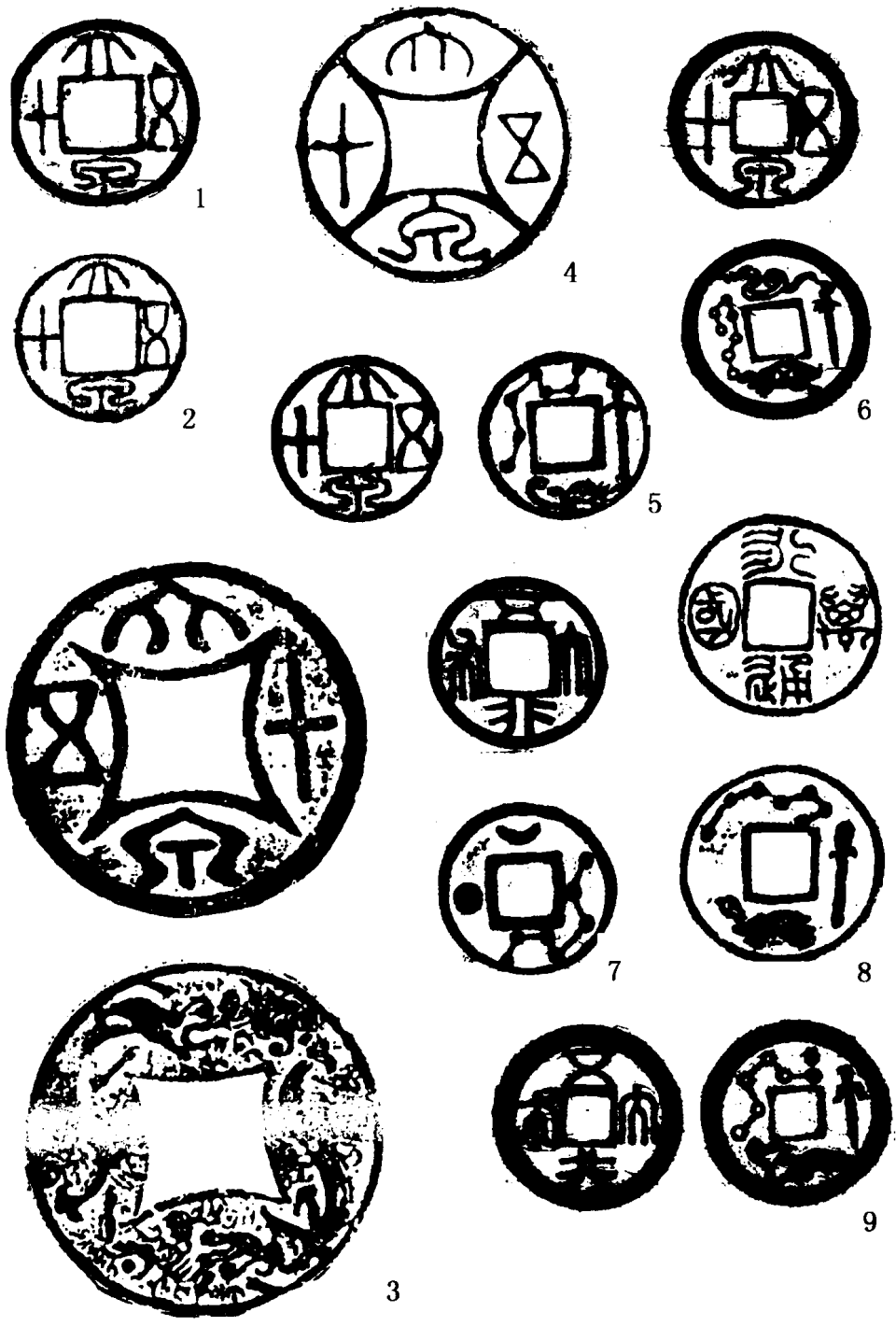
长期处在生活绝望关头的百姓找不到穷困、非命的根本原因，便去抚摸和亲吻就要捆缚死他们的那条绳索——宗教的锁链。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例如：为了平安，为了团圆和幸福，除了到庙宇进香、捐钱物、捐造像外，还要禳祷邪神和鬼祟，以期得到神、佛、天地的保佑和恩赐；以期得到邪神和鬼祟的宽宥。对那些通过道士、巫师可以压服震慑的邪祟则要书符（图十五）或铸制辟邪品进行镇压（厌胜），而钱形饰物就成为既方便又理想的厌胜品了。大量的吉利品为正面的祈祷物；辟邪品则成为反面的祈祷物。这一时期的民俗钱主要是铸造当代或前代的行用钱背加日、月、星、龟蛇、宝剑图案或人物故事、生肖等。如“大泉五十”、“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常平五铢”……一类的钱文图案、字体风格与当时流通的北朝钱相类。“大泉五十”为王莽钱名之一种，但这些背有龟蛇、北斗、宝剑的“大泉五十”绝不类莽钱文字书体（图十六），且王莽因讳“金”、“刀”之文而铸“六泉”、“十布”，所以他绝不会在钱背铸剑形、蛇形以应“金刀斩蟒”的谶语。后世为什么多有采用“大泉五十”之钱形的辟邪、吉利品呢？因王莽“大泉五十”钱名具有创新意义，且形制、文字之精美是先秦以来钱文盅无与伦比的，后世乐于效仿，如孙吴、北朝等均仿之。尤其是北朝时期所铸“大泉五十”民俗钱亦为唐宋以来历代民俗或泉家所效仿，其意皆在于此。另外，“大泉五十”为王莽所创，后世仿铸多在钱背铸剑、蛇图案，当是有意应“金刀斩蟒”之谶，视王莽为“邪”，以此钱为辟邪品，意味尤为深长。

民俗钱仿铸，自汉以后历代均有，选前代图案、文字精美者仿制，如“五铢”、“货布”、“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开元通宝”、“周元通宝”、“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泰和重宝”、“大定通宝”等等，这些钱无一不是书法精品。币材主要为青铜质，金、银、铁、铅质者少见。钱穿主要为方孔，圆穿者多为图案附文字钱，有些有反郭或四出纹等。大多数民俗钱钱体厚重，大小参差，大者如杯口，小者如鹅目，种类繁多。当然两汉、南北朝时期的民俗钱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继续认识，弄清它的总体面貌。

（二）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都高度发展的时期，尤其是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的大发展。唐代不仅大大发展了汉族文化，同时也吸收了邻国和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佛教、道教艺术也更臻完美。绘画、造型艺术亦由简率向繁复发展，如建筑、雕塑、金银器、铜器、瓷器等的纹饰、图案都比较繁复细腻。这一时期的民俗钱以镂空花草、虫、鱼、蜂、蝶、龙、凤、麟、狮、鹿、马、人物故事为主调。这类镂空钱多数起装饰作用，如服饰、马具、帘帐等等，龙、凤、麟、狮等钱也寓意吉祥、太平之意。镂空钱与其说是钱，莫如说是装饰牌更为确切些。这类环钱形的牌饰，在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中曾有出土①，据报告称共出土三件，皆鎏金，分莲花纹、云纹两种。直径约 7～8 厘米，孔径 0.9～1.2 厘米，一面微凹。出土时与马鞍子放在一起，断代为公元四世纪前期，其大小、纹饰已和花草纹镂空钱极接

①《文物》1984 年第六期第 29 页。



1、2 王莽“大泉五十”钱　　3～9北朝时期民俗钱

图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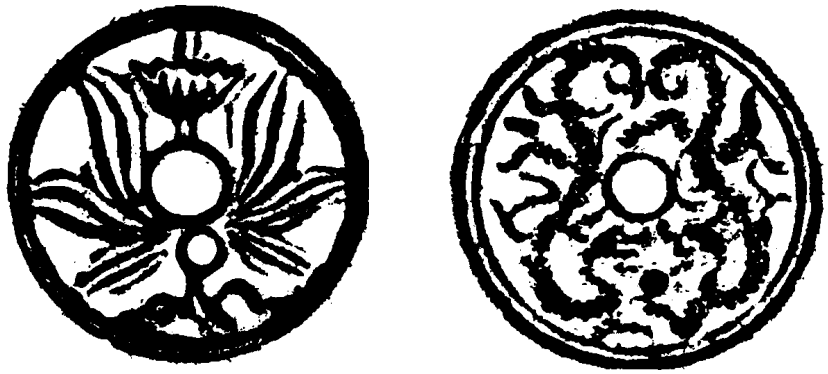
近，这应是镂空类钱形饰物作马具装饰的实物例证。另外，在山西大同南郊出土的北魏鎏金铜器中有圆形双降龙纹（图十七）和莲花形铜牌，与唐宋以来的莲花纹、龙纹

镂空钱（图十八）可谓一脉相承。南京郭家山东晋墓出土的 19件镂空钱形饰件①形制与辽宁朝阳袁台子出土的鎏金圆饰件相同。但直径很小，最大的 3.3厘米，最小的仅 1.5厘米。这种小型鎏金钱形饰件除作服饰外，大多数是作首饰之用。真正与钱币一起出土的是 1981年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北关的一座元墓，同出的有八思巴文折二、折三、折十钱和两三枚镂空龙凤纹大钱，直径约 5～6厘米，圆穿。



双降龙纹牌饰

图十七



1. 唐宋时期莲花纹镂空钱。2. 唐宋时期双降龙纹镂空钱。

图十八

镂空钱的断代，主要依据纹饰和铜质。镂空钱的蜂蝶、花鸟、双凤、双狮、双龙、双鹿等纹饰在唐宋铜镜和其他器物，如铜器、瓷器、陶器、金银器、雕塑、绘画中常见。特点是富丽堂皇，细腻繁复。艺术总是体现时代特色，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但是这类钱形饰在唐宋墓葬中少见，这是因为在唐宋以前，人们未将其当作民俗钱看待，而只是作为一种装饰品，如鞍具、帘帐等。直到元明时期才被作为厌胜钱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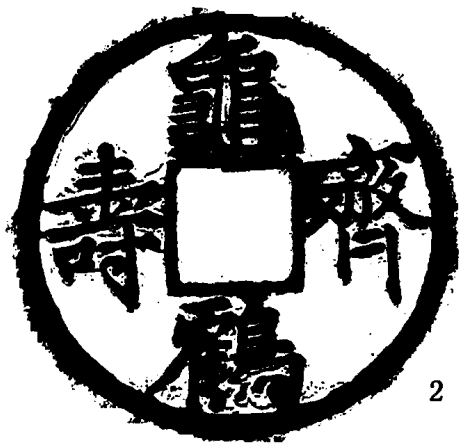
①见《文物》 1981年第 12期第 1页

唐宋时期有大量实体类吉语钱出现,如“上上大吉”、“龟鹤齐寿”、“龟灵鹤寿”、“长命富贵”、“宜尔子孙”(图十九)等等,以及背铸各种图案的当代或前代年号钱。反映道教内容和文化的符文、八卦、生肖钱也大量铸造。在少数民族风俗中，辽朝契丹人也仿汉人习俗铸造吉语、八卦和生肖钱。吉语钱如“福德长寿”、“千秋万岁”……。当然，这两种钱自北朝末至金、元各代均有铸造。酒令诗牌、选仙钱、打马格钱、棋钱（图二十）等游戏博弈品，主要产生于这一时期。


1


3


4


2


5

1. 上上大吉　2. 龟鹤齐寿　3. 龟龄鹤寿
4. 宜尔子孙　5. 长命富贵
图十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